

文化视角下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进路及其启示*

伍柳氏

(广西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1)

[摘要] 从文化与民主的关系的角度对民主发展道路作最一般考察和概括, 政治民主化演进的基本路径无非这样两条: 以先发国家为代表的“民主文化—民主制度—民主政治”进路和以后发国家为代表的“民主制度—民主文化—民主政治”进路。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 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只能遵循“民主制度—民主观念—民主政治”的路径演进。

[关键词] 民主制度; 民主文化; 民主路径; 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9)01-0006-05

一、比较中的“政治民主化基本进路”界定

所谓“政治民主化基本进路”, 就是指民主政治从其肇始初创、到发展变化、再到巩固完善的全过程所显示的具有一定典型性和普遍性的最一般道路演进轨迹。它是对民主发展的具体演进道路和历史经验一种理论概括和抽象描述。就此而言, “政治民主化基本进路”研究仍然是一个被人忽视而尚待关注的领域。就同类意义上的研究比较来看, 人们一般集中于涵盖面更广的政治发展模式的研究上。但二者是有区别的。

一般所说的“政治发展模式”, 是指“政治发展具有一定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道路, 它是对具体发展道路的一种理论抽象。”^[1]对政治发展模式的研究, 人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如亨廷顿提出了欧陆式、英国式和美国式三种西方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模式, 后来他和纳尔逊一起又把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道路概括为自由模式、资产阶级模式、独裁模式、专家模式和民粹模式等五种模式^[2]; 国内有学者把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概括为英国的渐进发展模式、法国的跳跃发展模式以及德国的被动发展模式^[3]; 也有学者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道路概括为两种基本模式: 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早发国家模式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模式, 而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又可以概划为以英国为原型的渐进—妥协模式、以法国为原型的激

进—革命模式和以德国为原型的保守—改良模式这三种典型的政治发展模式^[4]; 等等。

从上面关于政治发展模式的这些代表性研究来看, 它与本文所探究的政治民主化基本进路有以下一些主要区别: 一是研究的范围不同。政治发展模式理论上应将世界近代以来的所有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 而“政治民主化基本进路”的研究范围则一般只包括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以及取向民主化的国家。二是研究的对象不同。政治发展模式是对政治发展道路及其规律进行理论概括和抽象描述, 而民主化基本进路则主要以政治民主化路径轨迹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 而不是更为宽泛政治发展现象及其规律。三是研究的目的不同。政治发展模式研究的目的在于, 通过对不同国家政治的具体发展道路的理论抽象来概括出政治发展具有一定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道路, 并以此揭示政治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而政治民主化基本进路研究目的则是, 通过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具体道路和历史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 抽象描述出具有一定典型性、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式样和演进轨迹, 以探寻政治民主化道路演进的最一般规律, 并以此指导政治民主化的实践, 以减少政治民主化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促进政治民主化的顺利实现。四是研究的内容不同。政治发展模式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宽泛而丰富, 所有影响或相关政治发展道路的现象和因素, 都是

* [收稿日期] 2008-12-20

[作者简介] 伍柳氏, 本名戴回天(1969-), 男, 苗族, 湖南沅陵人, 广西师范学院,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政治发展模式研究所要考察分析的内容对象。政治民主化基本进路研究所包涉的内容则要相对狭小些,主要涉及与民主化相关的文化观念与政治制度两大块。

二、文化视角下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进路

众所周知,在分析影响民主政治发展的各种因素中,人们不约而同地都把“品德”、“性格”、“意愿”、“人民程度”、“国民性”等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文化”的因素视为民主政制创建的一个重要甚至决定性的条件,尽管人们在其他许多方面上存有不少的歧见。亚里士多德曾就明确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平民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体”。^[5]孟德斯鸠专门研究了罗马共和国盛衰的原因,认为罗马共和国的盛衰主要是由公民的“品德”所决定的。^[6]阿尔蒙德和维巴也明确指出:“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7]在反思中国近代民主化失败的原因时,梁启超认识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8]陈独秀也指出:“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9]而鲁迅更是深信,不改造国民性,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李大钊也看到,共和失败,“民权”失落,固有封建军阀窃取的外因,但究其根本还在于“民德之衰、民力之薄”。

上述思想显然不是在考察民主政治实现道路的演进轨迹,而都是在强调和论证“民主的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创建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但这些思想对我们探究和概划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进路却给予了重要的启示:民主文化是通向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它决定民主政治的成败。而下面学者的研究发现则为我们概划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进路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启发。

我国学者熊月之在对比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与欧洲民主化进程不同时注意到:

欧洲的民主思想进程是先提出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思想,然后再集中表现为开设议院的主张,遵循的是自由平等—议会制度这样一条逻辑。而中国民主思想的进程则是一开始就从政治制度着手,先提出立宪主张,而后才出现自由平等思想,遵循的是议会制度—自由平等这一条恰好与欧洲相反的逻辑。^[10]

学者丁守和也有同样的看法:

在欧洲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从 14 世纪出现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宣传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接着有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及其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科学的发展科学思想的流传及其对宗教神权和迷信盲从的冲击,启蒙运动兴起;经过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和民主思想激荡,而后才有民主革命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民主制度的建立,并在人权宣言和宪法中将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任何人都不得侵犯。而中国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借发富强”,“船炮工商”,“制械练兵”,接着是提倡“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民主共和。^[11]

以上二学者关于两种不同政治民主化演进路径的发现虽然是仅就近代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比较而言的,但这为我们研究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进路却提供了意义极大的启发。这就是从“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民主观念即民主文化与“议会制度”、“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等民主制度之间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事实上,就各国的政治民主化而言,也正如以上思想家和学者们所看到的,无论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千差万别,但都离不开这样一对关系——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各国的政治民主化演进路径无外乎以下两条:

一是由于社会内部自身的自然发展逐渐引起人们在观念上随之而自然地发生“民主性”变化即形成民主文化,尔后通过一定的途径把这种新形成的民主文化逐渐转化为现实的民主制度并赋予民主制度以生命与活力从而使民主政治得以实现。我们称此演进轨迹为“进路”。

二是由于外来的而非非本社会或政治体系本身自发生成的因素促使政治体系首先发生转变即架构基本的民主制度,尔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使置身此制下的人们的观念逐渐“民主化”即形成民主文化以使其最终适合并支撑改变后的民主政治体系,从而使民主政治得以实现。我们称此演进轨迹为“进路”。

这两种政治民主化的进路图式表示如下:

进路 : 民主文化 — 民主制度 — 民主政治

进路 : 民主制度 — 民主文化 — 民主政治

一般而言,任何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道路都可以归入这两种进路模式中的一个。西方先发国家如英、美、法等国,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道路一般可以

归属于“进路”。考察先发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演进发展的过程,不难发现,在它们创建民主制度之前,首先在其社会内部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政治文化“自然更新的过程。正是直接以这种文化更新为前提和动因,才使西方先发国家获得了民主政治的首先创立。关于西方先发国家先由观念更新而后到制度变迁的显现过程,学者王沪宁曾有很好的描写:“欧洲历史上曾有过一段黑暗的神学阴霾笼罩的时期。当历史的力量开始驱散这层乌云的时候,政治文化首先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便是后来欧洲政治风暴的黎明。对人的崇尚代替了对神的景仰,这是西方近代变革的深层结构。十九世纪瑞士学者雅布克·布克哈特说:‘文艺复兴于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由此出发,产生了震撼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有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代表新时代的政治文化已经走过几百年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所以当历史的时机到来时,旧的政治体系就被涤荡一清。’^[12]显而易见,西方先发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一般属于内部的创新过程,这是一个在整体上看属于自然、连续的生长流程。

而“进路”则可以基本上描述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道路的一般演进轨迹。众所周知,后发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开始的,“在这些社会的这种共同特征中,最重要的是它们有一个外国人的中心强加在他们的头上。”^[13]这决定了后发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不可能、也无必要如同西方那样经历一个自然长成的过程,“它不是、而且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过程在后发国家的一个重演。”^[14]而只能属于“外诱变迁”过程。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这种特点,使这些国家普遍认为,只要努力效仿西方的政治体制,就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推动民主建设。因此,“无论是拉丁美洲,还是亚非国家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都是把效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本国政治现代化的圣经。”^[15]大多数亚非拉新兴国家都制定了确立国家主权独立和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宪法,并建立了代议民主制的政体形式。

当然,历史表明,后发国家对西方先发国家政治制度的这种“快速移植”并没有迅速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些国家甚至因此反而使自己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的局面。而宪法则成了陪衬独裁政治的

花瓶,制度也成了掩盖独裁政治的饰衣。

然而,后发国家首先从制度构架入手试图实现政治民主化,对后发国家来说毕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个“已然”的过程。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已然”过程之所以显现得异常艰难曲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后发国家没有看到,民主政治的建立必须以相应的政治文化为前提。后发国家所看到的先发国家的民主制度只是结出的“果”,而不是成就它的“因”——先制度而在的民主的政治文化。前面已经提到,西方先发国家民主政治的确立是以数百年的思想启蒙并以此形成的相应的政治文化为前提而“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而后发国家却是倒“果”为“因”,把西方历经数百年孕育而结出的政治制度之“果”误当成使自己迅速建立民主政治、摆脱殖民统治、医治贫穷落后、实现独立富强之“因”。这种“因果倒错”,注定了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必然艰难曲折。这也给自己留下了一项艰巨的后续工程——创建鼎撑这种制度的民主的政治文化。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这样一个以内忧外患之身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社会来说,要实现民主政治以完成政治解放过程,就必须首先完成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的社会化过程。”^[16]否则,就不可能建立持久、真实的现代民主政治。

事实表明,一些后发国家效仿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最终获得了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最初的制度构架最终获得了相应的民主文化的有力鼎撑。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后发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实现无不如此。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就仿效西方初步架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到现今稳固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与日本在效仿西方制度的同时“仿效欧美改革旧教育制度、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休戚相关。它对日本民主制度的发展和最终确立“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17]。韩国在脱离殖民统治后不久的1948年就迅速地建立起了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的基本框架,但是直到1990年代初“民主政治文化在韩国终于脱胎成形”之时,民主制度才得以“根基坚固”^[18]而菲律宾获“亚洲第一民主国家”、“东方的民主橱窗”之美誉,则完全得益于“美国人给菲律宾留下的一整套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19]。

与此相比,一些后发国家至今之所以仍然未能实现政治民主化、仍然在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始终不渝地奋斗”,究其原因,除去民主文化的阙如之外,很难再找到其他的更有力的解释。

显然,与先发国家政治民主化历程所显示的“民主文化—民主制度—民主政治”的演进路径不同,后发国家只能遵循“民主制度—民主文化—民主政治”的政治民主化演进路径。尽管它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把政治民主化的不同发展道路概划为以上两种基本进路,与政治发展模式等其他模式概括和研究相比,有以下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这一概括既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又不乏一定的明确性、清晰性和直观性。它剔除了其他更多的具体因素而仅用两个概念:“民主文化”、“民主制度”来表述形式多样、风貌各异的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具体发展道路。同时它明确、清晰而直观地展示了政治民主化(而不是其他)“从……到……”的最一般路径演进轨迹并区分出不同模式所代表的民主化路径的最一般演进过程。而且这一概括还清楚地表明,民主政治,而非其他,是政治民主化的最终取向目标。二是这种一概括清楚地显示,在以民主政治为终极取向目标的发展进路中,无论是“进路”还是“进路”,民主文化是政治民主化过程和民主政治的最终建立必不可缺的决定性环节,社会成员的民主思想观念决定着民主政治的最终成败。换言之,“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收效。”^[20]

与此相比,其他相关的模式和研究,要么过于抽象和笼统而使我们很难直接发现这些概括是在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同道路所进行的概括和描述,要么过于具体而又使其丧失了应有的代表性、典型性和普遍性。

三、政治民主化基本进路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启示

以上关于政治民主化基本进路的研究表明:“民主化必须以努力创造一种民主文化为开端”^[21],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都离不开社会成员的民主思想观念的最后支撑。而后发国家对这种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倚赖尤显突出。这已被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和政治民主化的实践无可辩驳地所证实。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之所以艰难曲折、坎坷多舛,一些后发国家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民主政治之所以得以最终确立,都可以从其社会成员的民主思想观念即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最终形成这里得到解释。因此,对仍然尚未民主化而艰难跋涉在政治民主化征途中的国家来说,在构建了基本的民主政制框架之后,如何创造民主的政治文化,就成为这些国家民主化所面临解决的首

要重任。可以断言,对后发国家来说,没有在文化上首先获得突破,没有民主的思想观念普遍而深入地为社会成员所具备,民主就不可能在这些国家真正“安家落户”,民主政制也只能是一具徒有虚名的制度空壳。

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必然沿循“民主制度—民主观念—民主政治”的路径演进轨迹发展。事实上,就如学者熊月之、丁守和等人所看到的,中国近代的民主化历史已经部分地显示出了这一“逻辑”过程。就现实的中国而言,它也不可能跳出这一轨迹演进规律的规定。因此,在确立了基本的民主制度框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各种根本的、基本的、具体的民主制度)之后,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当务之急就是创建赋予这种制度以生命和活力的民主的政治文化。否则,最终的民主政治实现终将遥遥无期。因为,“民主制度、民主原则和民主方法,本身都是一些理论上的抽象。如果广大民众缺乏能够赋予这种制度、原则和方法以生命力的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种民主制度、原则和方法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民主化的转变,那么,民主政治就只能停留在纸上,再‘民主’的国体和政体,也只能是某种主观的想象物。而‘一个国家,只有在它的人民普遍接受民主意识、从心理和行为上转变为民主化的人格的时候,只有在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与民主化发展相适应的主体精神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化国家。”^[22]

中国政治民主化对民主文化的倚赖和渴求已为研究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的人们所公认为,也为历史所证实。事实上,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正是因为“民主文化”这一决定性环节的缺失而陷入了踟躇难前的困境。因此,在当今中国,任何有助于形成民主文化的实践措施和有效途径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所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推行村民自治、发展党内民主、完善政治制度、构筑市民社会等在内的各种政治民主化实践途径和思路,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所不可或缺的。这些实践途径在培育民主文化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除此之外,更为重要而根本的途径和实践则应是学校教育、大众传媒、设置“政治改革实验区”和逐步扩大基层政权直接选举范围等。

学校教育依据自身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扮演着可以系统而基础性地创造民主文化、塑造民主主体的重要角色,是一条“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23]。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能”为优势的大众传媒,假以有意识地宣播民主的观念,则必会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氛围。而设置“政治改革实验区”,逐步扩大基层政权直接选举范围等民主实践,让公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对公民深刻理解民主知识、真正掌握政治参与技能,以及将这些知识和技能内化为公民的民主素质,从而获得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意识,并使社会最终形成民主的政治文化,则更具终极而根本的决定性意义。

总之,作为典型的后发国家的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能依循“民主制度—民主观念—民主政治”的民主化进路发展。在这一进路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还处在整个发展进程的第一阶段,所完成的还只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民主制度”建设任务,“民主文化”的创建还处于缺无状态,而民主文化的缺失最终也使民主政治无法得以实现。为此,在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之后,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使社会成员普具备民主的思想观念,并使之真正形成一种社会文化之势,就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急务。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能获得“民主文化”的有效链接而抵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 [1][2][4] 王邦佐. 新政治学概要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300, 301, 302, 308 - 311.
[3] 钱乘旦. 世界现代化进程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26 - 142.
[5]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406.
[6] 孟德斯鸠. 罗马盛衰原因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7] 阿尔蒙德等. 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5.
[8] 梁启超选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07.
[9] 民主与科学的呐喊——陈独秀杂文代表作品选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 214.
[10] 熊月之.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17.
[11] 丁守和.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C]. 上卷. 绪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5.
[12] 王沪宁. 比较政治分析 [M]. 北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76.
[13] C·E·布莱克. 比较现代化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209.
[14][15][16] 潘伟杰. 现代政治的宪法基础 [M]. 导论.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1, 57, 60.
[17] 刘明翰等. 世界史简编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2. 492 - 493.
[18][19] 丛日云. 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104, 153.
[20]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7.
[21] 加利. 联合国与民主 [A]. 刘军宁. 民主与民主化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312.
[22] 汪耀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论纲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271 - 272.
[23] 参见关海庭. 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87.

(责任编辑: 朱德东)

General route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its inspiration in the sight of culture

WU Liu - sh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uangxi Normal College, Guangxi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this paper makes general examination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route. The basic route of political democracy evolution has two, one is democratic culture - democratic system - democratic politics represented by prior -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other is democratic system - democratic culture - democratic politics represented by post -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as a typical post - developed country, can only follow the route of democratic system - democratic culture - democratic politics.

Keywords: democratic system; democratic culture; democratic route; democratic politics; building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